

回忆湖南和平解放

我所了解的湖南起义.....	唐鸿烈 (1)
保护程潜的“应变计划”.....	程 杰 (20)
和平解放中的片断回忆.....	程岑华 (23)
省、市工农商“六团体”活动纪实.....	陈云章 (27)
唐生智在湖南和平解放中的一些活动.....	唐仁曼 (42)
陈明仁起义前后.....	唐生明 (55)
起义中的傅正模将军.....	韩子庚 (63)
回顾解放前的一段斗争历程.....	萧 艾 (68)
我所知道的省保安司令部起义经过.....	陈伯钧 (76)
省保安第二师的起义.....	周笃恭 (91)
保安第三团起义经过.....	谢德铭 (96)
省水上保安总队在长沙起义前后.....	肖伯良 (103)
省防空官兵集体起义记.....	万 天 (107)

我率三〇七师起义经过.....	张诚文 (111)
在湘国民党部队起义后.....	陆承裕 (119)
安化解放纪略.....	黄一俊 (126)
许新猷在岳阳起义.....	许子行 (132)
陈采夫与常德解放.....	陈克理等 (137)
我到益阳前后.....	陈扬汉 (143)
到湘南策动欧冠起义.....	肖如柏 (148)

历史文献资料

既不殖财亦不植党 决以政绩以谢乡人

程氏在欢迎会致词(1948年7月25日).....	(153)
对共党所提八项条件程主席发表意见.....	(154)
对共党八项条件 程主席表示态度.....	(155)
今日湖南应变的总方向	
——程潜主席4月11日发表书面谈话(摘录).....	(155)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四野继续南进的方针的指示.....	(156)
周恩来关于争取程潜等站在我方反美反蒋问题给乔木①	
电(摘录)、(1949年6月2日).....	(156)
程潜：备忘录.....	(157)
毛泽东给程潜电(1949年7月4日).....	(159)
中共中央军委对程潜的方针指示(一).....	(160)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占领长沙作战的部署.....	(161)
维持安定与保存元气 程主席信心坚定如故.....	(161)
林、肖、肖、赵关于我与程潜谈判情形给军委电.....	(162)
中共中央军委对程潜的方针指示(二).....	(163)

陈代主席训词(1949年7月22日).....	(164)
中共中央军委对程潜的方针指示(三).....	(165)
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 程潜将军和人民站在一起	
通电全国呼吁和平(1949年8月3日).....	(166)
程潜为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致毛、朱、林的电文.....	(169)
林彪、邓子恢转程潜来电(1949年8月4日).....	(169)
林、邓、肖、赵转李明灏等来电.....	(170)
程主任发表告湖南民众书(1949年8月4日).....	(171)
程潜发表告将士书(1949年8月4日).....	(177)
陈明仁发表文告(1949年8月4日).....	(179)
程潜、陈明仁起义通电(1949年8月4日).....	(180)
唐生智等通电响应程、陈两将军和平号召	
完成全国解放事业(1949年8月5日).....	(182)
湘全省在乡军官会拥护程潜将军通电.....	(184)
毛泽东、朱德复电程潜、陈明仁.....	(185)
陈明仁就任通电(1949年8月5日).....	(185)
中共中央军委对程潜的方针指示(四).....	(186)
中共中央对程潜的方针指示(五).....	(186)
林彪、罗荣桓、邓子恢复电程潜、陈明仁.....	(187)
程主委与解放军和协代表团 书告湘省起义官兵.....	(188)
陈明仁急电毛主席(1949年8月12日).....	(190)
毛主席答陈明仁电(1949年8月13日).....	(191)
毛主席、朱总司令电复程潜、陈明仁.....	(191)
程、陈复电毛主席、朱总司令(1949年8月19日)...	(192)
程潜将军离汉北上前答覆记者七项问题.....	(193)
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特别邀请代表陈明仁	
发言(1949年9月25日).....	(194)
毛泽东关于陈明仁部队的整编问题给林彪的指示.....	(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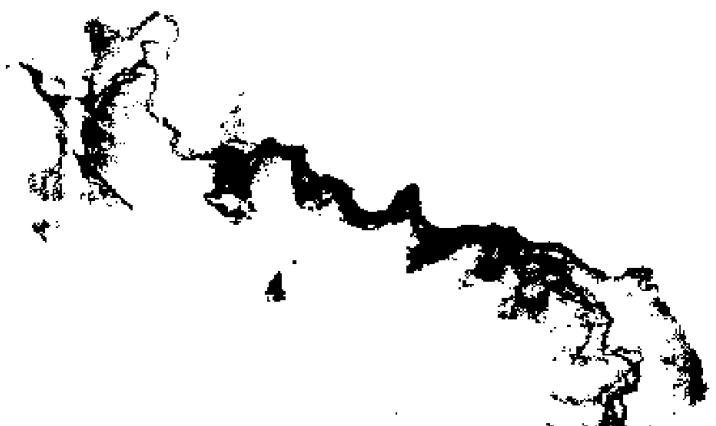
北京归来（1949年10月21日）.....	（ 200 ）
毛泽东给林彪、邓子恢、湖南省委的电报 （1949年10月31日）.....	（ 202 ）

大事记与篇目

湖南和平解放大事记.....	（ 203 ）
本刊曾发表过的和平解放史料篇目.....	（ 214 ）

补 白

苦难湘人要和平.....	（ 67 ）
解放前夕的长沙学运.....	（ 75 ）
长沙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	（ 90 ）
《庆祝长沙解放》.....	（ 106 ）
议长选举内幕.....	（ 118 ）
长沙市和平促进会.....	（ 147 ）
衡宝战役.....	（ 152 ）
湖南和平谈判.....	（ 220 ）



我所了解的湖南起义

唐鸿烈*

1949年8月4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率部起义，湖南和平解放了。在湖南举起义旗以前，当地一些军政人员虽曾各寻门路，互找关系，密谋起义活动，然而无一不以程潜马首是瞻，因此程潜本人的态度和活动举足轻重。本文仅就我亲身经历所了解的真实情况，叙述程潜密谋起义的一些史事。

在1948年夏以前几年之内，蒋介石历派亲信先后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而籍隶湖南的军政人员却始终无法染指，相互争权夺利，矛盾重重，以致“湘人治湘”的呼声，又盛极一时。程潜曾受蒋介石的打击、排挤，于1948年3月间又遭胁迫，中途愤愤放弃副总统的竞选，迫不得已领取了蒋所补续的一笔竞选费用之后，只得退而求其次，自愿出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当时，程潜向蒋力保湖南人李默庵继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以期控制该省军政大权。由于李系广州讲武学校学生又是蒋黄埔弟子，是蒋亲信，又出自程所保荐，大可籍此以避嫌，不料已为蒋所摒弃息养于上海的贺贵严，纠合赵恒惕等联名函蒋坚决表

* 唐鸿烈当时系国民党监察院监察委员。

不反对；建议起用资历较深的湖南人。于是蒋采用陈诚之谋，改以另一亲信、黄浦弟子、湖南人黄杰以代李，征求程潜的意见。程与邓介松和我等商议，一致反对陈诚插手湖南，认为李既不成，力主程潜本人乘此机会“当仁不让”，亲身顶替，以为抵制。为求缓冲，可请另委李、黄为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并兼其他实际职务，以辅助于程，将来看谁适当再保谁继任。计议妥定，经程潜面蒋提出后，蒋只得同意。因此，中央政府明令发表程潜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并以李默庵、黄杰任该公署副主任，且派李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驻于湘西常德，黄兼第五编总司令，驻于湘南衡阳。其实，程荐李、黄两人以为辅佐，蒋正好利用他们以牵制程潜，尤其是程的出任，既为权宜之计，终将落于李、黄任何一人之手，也正切合蒋之心意。加之程挺身而出，李、黄两人相形之下，以程究系湖南的老前辈，也只好暂为退让，容忍于一时。

援“一朝天子一朝臣”惯例，湖南省政府各厅、处长人选，几经商酌，始以程潜原所属武汉行辕秘书长邓介松连任省政府秘书长。经邓介松建议，以与邓原同为改组派后被CC所拉拢，曾助程潜竞选副总统的邓飞黄为民政厅长。又接受唐鸿烈建议，以与程原有历史渊源、在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色彩尚不明显而有一定业务技术能力的王恢先和李维城分任建设厅长和省银行行长。其间，三青团方面对邓介松出任秘书长不满，因其在竞选立法委员中虽经失败，但接近CC，曾派军统特务杨继荣面程表示异议。适我在座，向杨指出：“秘书长系一幕僚人员，向随主管共进退，主管自有权衡，任何方面不能反对，否则这个主席很难干下去。”程亦赞成我的意见，坚持邓介松任秘书长。程遂指我为私人代表与行政院联系，因此又接受我所建议戴朝震任湖南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其他厅、处长，程意暂维原状，事实上各有背景，一时实无法更动，抵任

后始逐步调整。

自程潜抵任后，宣扬以“确保治安，开发经济，加强建设，兴办教育”作为所谓施政方针。由于程素不满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经授意邓介松等策动省参议员改选我父唐伯球（时任副议长）为议长，以排赵。程潜又感于省防空虚，地方治安武力单薄，除督促整编地方保安团队并改编其中一部分为第一、第二保安旅外，其后屡电中央政府在湖南成立新军。当时陈明仁已经失宠于蒋，心怀不满，被白崇禧拉拢。先充李宗仁代总统时期总统府参军，旋随白崇禧任武汉警备司令，始终并无实际兵权。因陈与程潜既系醴陵小同乡，又出自广州讲武学校程氏门下而后转入黄埔军校，相互关系较深。经程向白商调，白为利用陈以插手湖南，使其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地位进而控制湖南实际兵权，所以同意将陈调任第一兵团司令，驻于长沙，并由程派兼长沙警备司令。由于黄埔第一期所谓“老大哥”李默庵、黄杰以及陈明仁先后返回湖南，同学带同学，老大哥带小老弟，从此出身于黄埔军校各期的“黄马褂”纷纷“荣归故里”，既集一时之盛，又显赫于当时。就以上“黄埔三巨头”与程潜关系而言，陈最深、李次之、黄更次之，但他们仍各拥有实际背景和靠山，因而互争雄长，各以湖南省候补省政府主席自居，而自我陶醉。正因为如此，在明争暗斗、各显神通中，陈明仁以掌实际兵权虽于1948至1949年间，一再为白崇禧向中央政府力保继程潜之后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但陈究感大势所趋以与程潜密谋湖南起义，终于1949年8月4日在长沙同时举起义旗，投向了人民；而黄杰则于建议撤销总司令兼职之后，奔台湾走广州，始终顽固不化，终于1949年8月间为陈诚力保出任最后一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招兵买马于湘西沅陵，不及一月，亡命于台湾；至于李默庵，原于建议撤销所兼绥靖区司令后，坐以待变，然日见形势逼人，转

面自请参加起义，竟于湖南起义前出走香港。

二

1947年冬开始，人民解放军有如排山倒海之势，先后解放黄河南北各地。湖南在抗战八年期间深受日本帝国主义浩劫、摧残，胜利之后连年天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间，我曾向程潜游说，坚主反蒋联李（宗仁），促使和平。因又奔走于李宗仁之门，来往于南京、长沙之间，从事反蒋联李的活动。时白崇禧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名义向蒋介石提出“和平解决”主张，实则逼蒋下台，拥李宗仁登场，从而抬高挂系权势。程潜感于湖南实际情况既不可战，也不能战，故电蒋响应，力主和平。后蒋“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我遂又陪同程潜一再前往南京商谈所谓“和平大计”。当时在蒋方面原只利用和平为幌子，争取喘息于一时，企图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在李方面则以挂系实力为基本，企图保持残余势力，以待价而估。至于程潜，在与我商谈中，认为“只要使人民少受痛苦，一切和平条件皆可商谈、接受。”但是由于蒋明为“引退”，暗则在幕后操纵、调动一切，经过各方面商谈，尽管已就所谓和谈代表团人选大体上达成了协议，然而实际上并无和谈诚意。尤其是行政院长孙科，当时公然宣扬：“既要惩治战犯，就万万不能接受。”事既如此，名为和谈，实则反对和谈，所以孙科坚决主张将中央政府迁往广州，行政院即首先带头迁动。

自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我在长沙因既不满现状，又感大势所迫，曾密劝程潜步傅作义后尘，等待时机率部起义。由于程潜当时亦列名为战争罪犯之一，对党和人民惩治战犯深所顾虑，曾经对我说过：“你们监察、立法委

员也是战犯，这不是儿戏。”我闻之，虽亦有所疑恐，但知傅作义起义后并未闻加以惩办，心想“如果惩办起义人员，那还有什么人起义？”因建议先约李达同志一谈，试探一下情况再说，程同意。我拟乘前往南京参加监察院会议之便转往上海寻找中共组织。

自我去南京临时被推负责监察院所组织“国家财物清查委员会”工作之前，曾一度去上海，适与商船学校校长周均时遇晤。相互商谈，彼此感于大势所趋，相约周返重庆原籍、我返长沙，分别策动起义。其间，周曾邀我同往会晤当时寄住医院的邵力子，我以知邵并非党员，婉言谢绝。周即赶乘班轮回川，我则应邀迁住其家，于清查工作告一段落后争取监察院疏运包机先去广州，随即转回长沙。据方叔章告，程、李(达)会晤，李曾劝解程的顾虑，并建议召其子程博洪自沪来长，认为可能有所帮助，程已接受，但对惩办战犯一点，仍有所顾虑。后程博洪果一度来长沙，劝其父将醴陵所置田产交与农民。

不久，中央政府和谈代表团抵达北平，传闻中央政府最后拒绝接受和平协定，因而和谈宣告破产，南京解放在即，李宗仁返回桂林老家。在程潜与唐伯球、邓介松、方叔章和我等先后商讨局势中，我已见长沙街头巷尾贴有“打倒刮国民党”、“打倒刮民政府”等标语，且认为李宗仁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留守桂林走局部和平道路，另则仍去广州与蒋合作。察其情况，去广州成份居多。因此建议程唯有走局部和平道路，等待时机宣告起义。但程认为有选派一人前往桂林，一探李宗仁真实态度的必要。事后，邓介松物色当时赋闲在长沙的闽系湖南人苏民，说明只是前往了解李宗仁态度。后据苏告，李已决定即去广州仍代总统。事既如此，桂系何去何从已一目了然，自不能再对李存丝毫幻想。经我自告奋勇并得程潜同意，代表程前往香港通过我与黄绍竑的关系，与中共华南局乔冠华联系起义事

宜。乔当即表示欢迎，并交代政策，以解除程的顾虑。自我汇报后，程确已逐渐消除顾虑。由于唐伯球感于程潜在湖南往往以“家长”自居，人多远之。当时赋闲居家在宁乡的周震麟、在东安的唐生智、在长沙的仇亦山等虽亦反蒋，然与程潜各有不同程度隔阂。为求统一意志，加强团结，有利于湖南起义计，经与邓介松和我商妥并得到程潜的同意，决定由唐伯球往访唐生智。唐伯球等人商议，由陈云章接唐来长，共商起义大计。旋又由唐伯球亲函周震麟，痛陈局势，说明利害，劝与程合作，共策大计。周亦函覆表示同情，惟称因病一时不能来长。此外，由唐伯球和我父子分访仇亦山疏解一切。据仇告我，他已接匿名函件力劝他“认清大势，靠拢人民”。他也认为唯有起义，才是出路。之后，仇向我提出请为其婿钟少祥代谋工作，经我向程潜说明利害关系，程乃派任钟为湖南省政府秘书。基于以上情况，当时以程潜为首所有反内战的人企求局部和平的统一局面开始形成。

稍后，在我前往广州就医期间，据曾与我留英同学、时任行政院秘书长之黄少谷告，白崇禧认为程潜年事已老，不足应变，已建议李宗仁将程免职，改任考试院长，以陈明仁继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我遂赶回长沙转告程潜，但对以陈继任一节，为避免造成隔阂，秘而未宣。在我与程商谈中，知白崇禧亦曾以改任考试院长一事征询过他的意见。不日，陈明仁果然访问我，表示请予支持，我曾含糊其词。究以关系重大，乃利用李默庵与白崇禧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个人野心，动员他联名在湘军事将领通电反对。李为本身利害计，当即同意，即由李领衔联名黄杰以及当时驻在湘西的宋希濂等人通电李宗仁、白崇禧，拥护程潜，仍主省政。事后据李默庵反映，陈明仁拒不签署，显系利害冲突所致。自通电发出并在各报披露后，李宗仁、白崇禧迫于此一形势，自未敢轻举妄动，反而趋于稳定。

因此，以程潜为首密谋湖南起义的活动，得以仍然照常进行。

李默庵感于局势发展，形势逼人，也曾见机有所动摇，曾密向我表示：“如程潜有所决定，决随程一致行动。”经我转商于程潜，当经策定，以陈明仁驻守长沙，令李率领其所属并指挥湘南兵力守宝庆（今邵阳），以期配合策应，一俟白崇禧路经湖南退走广西时，即配合人民解放军予以侧击、追剿。因此，我即邀同李至程潜处，由李迳向程表明态度。当时李自称原系中共党员，后经背叛，为求慎重计，请程介绍他亲与中共党的负责人见面，始为稳当。程于说明意图后，命我陪同李前往香港一行，所以又陪同李至香港往访乔冠华同志。经乔与李谈话后，李表示愿在起义中立功。事毕，仍同返长沙。

不日，曾与我在大学时代先后同学的王烁然，自称代表党地下组织3130团策反于我。以我明知王在大学时代确系党员，后在相互过从中，亦知王在上海杨树浦从事工人运动地下活动，我除将湖南密谋起义情事据实以告外，并介绍与我父唐伯球联系。后又由我约李默庵，并由李邀集彭杰如、王劲修以及刘进（第一兵团副司令）等人，在我胞妹唐鸿钧寓所与王和王所约3130团另一负责人刘某（忘其字号）见面，策划起义事宜。其中所邀约的人员多与我先取联系，因我并不经常在长沙，后经商定由王烁然先与他们密取联系。王以工作关系曾经请我代觅适当住所，后经觅妥，与我所寓邻近，从此过从渐密。

后程星龄（系程潜远房本家，当邓介松在省府处境困难时，意欲利用他与程潜的关系有助于邓，经与我商议，由我向程潜提出派任程星龄为省府参事。后邓介松以加强经济建设为名在省府秘书处下设置经济委员会，经邓签报程潜派程星龄兼任该会主任委员。）密告我，谓已与中共省委汪某（解放后始知系指周礼同志）取得联系，我亦将已与3130团取得联系一事

密告程星龄。后据程告省工委，并不知此一组织，我半信半疑。事后与王烁然见面时，曾于便中询及3130团的组织关系，王称“该团系武汉军委所直接派遣”。我自无从查考，仍信任无疑，密取联系。

当时中央政府早已迁驻广州，阎锡山受蒋介石之命继何应钦之后任行政院长。武汉解放，白崇禧退驻长沙，桂系各路军队纷纷压境，不仅情势呈现紧张，且因征兵、征粮，更加重了水深火热的湖南人民的负担。群情激昂，长沙街头巷尾已见有“打倒白崇禧”的标语，当时还盛传“挖断粤汉路，葬送广西兵”。

白崇禧自退驻长沙后，眼见程潜并无“应变”措施，特务又从中捕风捉影，因而对程已加怀疑，竟先自督令陈明仁以长沙警备司令名义根据特务所拟“黑名单”乱捕乱押，大肆镇压。尤其是当李默庵旧属314师师长陈达经我认可，先与3130团王烁然等直接密取联系后，不料陈达竟先自行行动，首先起义，致被白崇禧调动兵力将该师围剿于宁乡县莲花桥一带，仅该师程杰团因驻扎岳麓山才得以保全。事后加以改编，使白崇禧更加怀疑程潜，并因此又造成程既不满于陈达，又疑及李默庵背弃于程，擅自行动。事后经我向程密为解释，又认为我“荒唐”与“荒唐鬼”联系。如是，就不能不使我对王烁然心存警惕。

此后，由于程潜感于邓介松个性倔强，且多意气用事，外界已有所不满，深恐激成事端，经与我商议，由我力劝邓辞去秘书长职务，仍保留省府委员。我曾建议以程星龄继任，程潜感于同宗关系，先有顾虑，后亦无可。经我征询仇亦山等人意见，都认为“不熟悉情况，不恰当”。及至征询他本人意见时，则以“地方情形复杂，干不了”，无意出任。我遂商之于我父唐伯球，接受我父所建议向程推荐与程潜、邓介松都具有历史渊源的桂系中人、湖南人杨积荪继任秘书长，程即同意。

旨在利用杨与桂系的关系，调解、疏进程与白的关系，避免再遭受其压力。杨见湖南民穷财尽，群情激昂，亦认为白崇禧“操之过急”，感于程潜知遇之情，自愿为程与白之间的桥梁，竭力从中疏解。至于密谋湖南起义一事，则相约对杨守口如瓶。自杨到任后，果收缓冲于一时之效。此外，因我见当日中央日报载有民政厅长邓飞黄贪污事，邓为CC分子，深恐对起义有所影响，又经向程潜建议改派正在参议院内部配合工作的刘公武继任。程潜亦同意，除由我介绍刘与程见面外，我曾自告奋勇先向邓飞黄劝说请其自动辞去民政厅长职务。当时邓对贪污一事力为辩解，表示“决不自辞，除非将我撤免”。程潜深恐引起事端，不仅作罢，且加慰勉。由于我从中力劝邓介松、邓飞黄各自辞去所任职务，都因此造成两邓与我之间的隔阂和误解。邓飞黄竟向外谣传我在于猎取民政厅长职务。

其间，曾与我熟识的工商业者曾诚意介绍党员刘润世与我父子相见，进行策反工作。在与我先后联系中，我密告李维城，使我的妹夫章劲伯认清形势，随同程潜起义，并嘱章劲伯做好省银行财产、物资、文卷等保管工作，以便日后移交。

当时湖南省政府财政极度困难，已无法维持，程潜除责成省银行行长李维城设厂自铸银元，以应急需外，并派我持程函件前往广州面晤行政院长阎锡山，请求设法接济。因此，我又不得不以监察委员身份来往于长沙、广州之间。我在广州曾访行政院秘书长贾景德及阎锡山转达程潜要求，并说明情况，当允设法。事后在门首适与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遇晤，据告外界传说程潜“态度不稳”，试图从我口中得到真实情况，我满口否认。不日，李宗仁约我谈话，阎锡山也在座。李就程潜态度一事盘问于我，我力加掩盖并多方解释，表示绝无其事，且谓：“程颂公为党国元老，历来忠党爱国，且已名列战犯，如有流言，必系特务从中谎报邀功，或系他人别有用心。”我观察

李、阎颜色，似已收获相当效果，乃进一步提出如对程仍有怀疑，则请阎锡山亲往长沙一行，以明究竟。”阎当即表示即可拨款并加赈济，并说：“抽不出时间，难于成行”。于是，我提出是否可以派贾景德代表前往，以为理直气壮，虚张声势。李宗仁表示同意。事后贾果通知我，谓即动身前往长沙，希望陪同一行，并请代邀其故旧方叔章在长沙一晤。我即以长途电话密告程潜并请转知方叔章妥为布置，以免泄露。

后我陪同贾景德乘专机携带赈款抵达长沙，经程潜召集省府有关各厅、处长向贾汇报“施政”情况，贾当场表示满意，仅在长沙居留一日夜，又邀我同返广州。我因已与程潜商议应否派一代表前往北平接洽起义一事，尚须去香港征询乔冠华同志意见，所以应邀同行。在途中，贾忽又提出：“我看程颂公意志正为消沉，”又加试探。我加以辩解说：“时到今天，谁不消沉？我看阎院长也很消沉。”贾于是也有所感慨地说：“今天真是已经到了焦头烂额的地步，请转告程颂公放心，他和我阎院长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他的诗我是一向钦佩的，他的困难也就是我们的困难，没有不想法子的。”至此，我认为已经水到渠成，无庸顾虑。事后行政院果已请发湖南省政府一笔经费，勉度一时难关。

我在广州期间，曾晤及原在英国先后同学现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他以湖南大学校长一职虚悬已久，意欲我接任，且经表示如有任何困难，一定代为解决。我感于湖南不久终肇起义，实已无意增添此一负担，且告“早已无意做官”，加以谢绝。但杭坚持，并容我考虑。后我转往香港向乔冠华同志汇报情况，曾要求电告人民解放军早日直逼长沙，以便配合策应，及早采取行动，并询是否可以派一代表前往北平。乔未加肯定，只是说：“这由你们自己决定。”旋我就应否就任湖大校长一事征询乔的意见。乔认为：“即可以团结一部分人，也可

以避免落在他人之手。”我亦以为然。

我在香港曾访晤黄绍竑，黄告正组织在港有关人员于必要时通电起义。并谓：“倘程颂公在长沙处境困难，盼来香港则由程领衔发表宣言”，再囑我代为转达。后又晤章士钊，章将所拟以和平代表名义致李宗仁电稿一份囑我带回长沙送程一阅。该项电稿经我存放在我的手提皮包内，自香港返抵广州匆匆下飞机时，竟将提包落在机仓内。事后发现，通过监察院秘书处派员向特务组织“机场检查站”索回，经加检视似有所翻动，但幸未遗失。

我在广州除向杭立武表示可以接任湖大校长职务外，曾就便参加监察院会议。事后应新闻记者之请发表对有关时局的谈话，原来语意双关，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有所讽刺。不料返抵长沙后见当日中央日报上刊载中央社所登电稿，竟然擅改谈话内容，以为假籍利用，反为国民党中央政府帮腔。气愤之余，经自行另写一稿表明“一切应以人民利益是从”，亲交由湖南省政府新闻处刘伯谦印发各报、分别发表。

后我将章士钊所拟电稿送程，并向程潜汇报此行情况。由于白崇禧在长沙一再采取压力，催促采取所谓“应变”措施，当经进一步商定先由省政府秘书处指派少数人员将省府重要文件、档案、器材等疏运宝庆（今邵阳）待命，必要时为避免白崇禧加害程，即率领必要人员退驻该地暂避，一俟白退出长沙，然后赶回通电起义，与国民党中央政府断绝一切关系。但程感于李默庵原已应允驻守宝庆布置指挥，而李遣送眷属去香港尚无返长确讯。以宝庆地区关系重要，一时难以物色其他适当人选，程颇为忧虑，也正愤慨。我当即表示亲往香港一转，促其速返。旋又谈到派遣代表以及湖大校长问题，程基于我自愿，拟派我一行，然未肯定，至于湖大一事，始知行政院已经电程潜征询意见，程已电复表示同意。我为慎重计，曾又

将此事告知程星龄，请其转为征询省委意见后，再作最后决定，程允为转达。

其间我曾将黄绍竑的意见转达于程潜，适唐生智在座。我建议程未当不可以就医为名前往香港一行与章士钊一谈，湖南之事可请唐生智暂代处理一时。程未置可否，转而注视于唐生智。不意唐生智竟对我说：“这不好，我不行，你老太爷不会有这个意见，即有也应该说清楚。”我于当时即感突然，又为诧异，一时竟无词以对。我为息事宁人计，并未向程作任何解释，也未转告我父。事后思考黄绍竑用意固属不利于湖南起义，然而却完全没有想到竟因此造成程与我父子之间的误解。以为我父子背弃于他，转而拥护唐生智，其实并无此意，再事实也不可能。

稍后某一日，我为派遣代表一事，拟与程潜再作进一步磋商。当我刚走进省府办公楼适与杨积芬遇。我顺便至杨的办公室一谈，忽闻有一人高声询我：“听说你要上北平当代表，什么时候动身？”我深以为异，且当杨之面提出，更是一惊。细看此人原为邓介松亲信、曾任过县长的余如愚，我当即否认并加威胁：“倘再造谣生事，一切后果唯你是问。”杨见我气愤，亦加告戒“万勿乱说”。余遂不敢声张，唯唯而退。事后我与程潜磋商时，由于我再三考虑结果，既已与华南局以及省委取得联系，加以交通不便，建议不必再派人前往，程亦同意。我深恐程有所顾虑，并未反映余如愚之事，仅曾询及是否将此事告知他人？程说“没有”。但我自审仅与程一人商谈及此，且未肯定，何以余如愚了解？不无所疑。事后与我父谈及，依他判断，邓介松当时已返湘乡原籍，并不在长，程应已与程星龄商谈，事必为他传出。并告：“我近来发现程星龄相当利害，应当注意。”且谓余如愚自被撤职后，已在省党部调查室工作，不能不戒备。”我始知余系一中统特务。言谈及此，我父又指

出：“你的同学王烁然已属荒唐，你的另一同学周匡斗又介绍我与一党员见面，不知周匡斗此人又是如何？”我父子原在家庭问题上一贯矛盾正深，我于当时见我父又连带疑及其同学，感慨之余，除说明周虽非党员，但决不是坏人，与党联系并不在于介绍人，劝仍大胆放心先与党员联系外，又经力劝我父将他所有田产尽数交与所种农民，以解脱地主身份，并将在香港市面所购有关党的书册捡了几本送请一阅。当时我父虽亦认可，但事后据我所了解究为我姨母所阻，未能实现。

由于白崇禧在长沙采取镇压手段，严令长沙警备司令部大肆搜捕，受难者大有人在，中央日报社长段梦非，民族资本家曾诚意等即先后被捕下狱。我除曾设法营救，终于配合其他方面力量幸免于难外，我曾密告程潜：“如陈明仁果系被迫确有困难时，最好劝他无论对任何人都应该采取明捕暗放的办法。”程答：“这个办法很好，等我想办法向他讲。”事后传闻似已收到一定的效用。

我为催促李默庵从速返长一事，本拟即去香港，奈为病所羁，稍愈后始成行。行前曾至程潜处将章士钊所拟电稿索回，以便带回交章保存。事后正上飞机时，适长沙绥靖公署秘书长刘岳厚与程星龄两人下机，交谈之下始知他们两人为起义事同去香港访晤乔冠华。我即追问情况如何？刘谓“与你所谈所知尽同”，而程星龄在旁始终一语不发。我上机后辗转思考，以从未闻程潜告及他们二人去港之事，不无所疑。我自抵港后，恰在公共汽车上与乔冠华相遇，经乔建议下车在附近一咖啡馆内交谈。我择要汇报情况后，乔要我速将湖南军事配备情况写一材料送至新华通讯社他本人亲收，并告他不久即前往北平，此后可与该通讯社总编辑曾同志（已忘其字号）联系。我将章士钊所拟电稿失误之事简略告知乔，乔说：“应提高警惕。”我内心深感愧悔。